

主持人按语:辽阔而富饶的蓝色海洋为古今中外的作家与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从“精卫填海”的故事到艾青的咏海诗歌,从《奥德修斯》到《老人与海》,这些经典海洋文学作品是我们研究人类海洋文化、研究海洋人文精神的宝贵遗产。“海洋文学研究”既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也是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对海洋文学的研究不仅体现着国内外学者对不同类型文学的研究兴趣,扩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也表明各国学者在文学研究中所担负的现实责任与历史使命。依托浙江省重点人文社科基地“海洋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段汉武教授等成功申报了浙江省高校创新团队“英语海洋文学研究”;依托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合作共建的研究中心,又成功申报了中国社科院的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论英国海洋文学中的帝国意识形态构建”。本期选发的两篇论文以文学功能与海洋意象为重点,前者论述了西方霸权文化先行策略,后者结合作家分析人类与海洋的多重情感,是该课题组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从西葡古典文学看西方霸权的文化先行策略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一般而言,史学界在讨论中西方关系时,大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宗教及政治经济范畴,顶多由此延伸至科技、美术、建筑等显性领域,对于相对隐形的文学则极少顾及。而事实上,文艺的功用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屡试不爽,西方列强自然深谙文艺在国际交流中的巨大作用。西葡等早期殖民主义国家的对华交往更是彰显了这一点。

关键词:海洋文学; 西班牙; 葡萄牙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1)04-0001-06

《越绝书》卷八《记地传》中载有勾践谓越人语,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如飘风,去则难从”。此话应该不假。别说两千多年前我们这一带就有了海洋文化;即使最上溯 5000 年,古越人的海上功夫就已十分了得。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那些陶舟和木桨便是明证。即使这些都可能是内陆水际文化的表征,那么殷人东渡的传说及郑和航海的历史当可证明越人的水上功夫至少也是古代中国海洋文化的一个雏形。由此,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关于东方文明是大陆文明(即黄色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即蓝色文明)的说法就很不可信了。^[1]

是的,黑格尔的观点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反过来硬说中华民族具有海洋文化传统显然也是片面的,盖因个别现象和局部的地域文化不能改变中华民族历来以农耕生活和逐鹿中原为主要取向的内陆文化精神。此外,综观西方历史,海洋文化确实是其文化谱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希腊、罗马到西、葡、荷、英、法帝国在西方历史上的盛衰与更迭可以看出,这些大国的崛起多数具有海洋文化的鲜明特征。问题是,今人看大国崛起,首先关注的往往是其一般意义上的时行政治和经济,甚至片面强调其军事实力。而文化,乃至文学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则常常被轻视,以致忽略。这一方面与

收稿日期:2011-04-07

作者简介:陈众议(1957-),男,浙江绍兴人,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外文学交流。E-mail: tongychenz@yahoo.com

文学和狭义文化不显山露水,并且常常润物无声的存在与表现方式有关,另一方面则多少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方法。

记得“文革”前夕学校讲授近代史的时候,很注意某些属于文学或狭义文化范畴的细节,但现在却很少有人提起了。比如说“9·18”之前日本中小学教育中曾盛行实物教授法,即老师在课堂上展示或分发实物,比如苹果,然后告诉学生,这甜美的果实来自中国,或者说中国的苹果比这更大更好,要想吃,你们就去占领这个地方;那儿地大物博,气候适宜,要什么有什么。这颇能使人联想到哥伦布时代西方对东方的描述。受马可·波罗等早期西方商人、冒险家和传教士的影响,哥伦布曾乐观地视包括中国、印度、日本在内的东方是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世外桃源。以他的估算,船队一直向西航行,一周之内当可抵达日本;如果遇到顺风,那么航行时间还将大大缩短。在他的忽悠下,刚刚在针对阿拉伯人的光复战争中大获全胜的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萨贝尔欣然允诺,并慷慨解囊,资助这位历史狂人前来东方冒险。当然,航行的结果并非一周,而是数周逾月。因此,哥伦布的船队几乎是在完全绝望的情景下发现新大陆的,而哥伦布却误认为它便是东方的印度。于是,他效法先人,在《航海日记》和致卡斯蒂利亚女王的信札、奏呈中盛赞这片土地,说它到处都气候怡人,物产丰饶,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伊斯帕尼亚岛(即西班牙岛,也即现在的圣多明各,因后来西班牙殖民者发现了真正的陆地,并将今墨西哥一带命名为新西班牙),简直如同仙境。这里深水环绕,河流交错,令人称奇。内陆高山入云,连绵不绝……它们是那么俊美,那样多姿,简直难以言表。万千植物和参天大树都四季常青,如沐西班牙五月春风。它们郁郁葱葱,硕果满枝……夜莺在丛林里歌唱,小鸟唧唧喳喳……绝对令人流连忘返。”

他见到的第一个岛屿,即心安理得地以西班牙命名。现在看来真是无耻之尤。他兴高采烈地慨叹,那里的树木非同寻常,竟然一棵树上能长出几种枝叶,“有的多达五、六种。别以为那是嫁接的结果”。那当然不是嫁接的结果,而是美

洲热带丛林各种寄生植物相互交叉的缘故。他还说,“这里的鱼儿不同凡响,堪称奇迹。有的比世上最最漂亮的公鸡还要鲜艳,蓝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简直是五彩缤纷;有的色彩斑驳,可谓千奇百怪、难以名状”。至于印第安人,他描绘说:“印度人古道热肠,毫不吝啬。”他甚至向西班牙天主教双王保证说,“全世界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了”。为了吸引世人的视听,哥伦布甚至似是而非地夸大事实、哗众取宠,把美洲描写成遍地留金的“黄金国”,说“河流中黄金俯拾皆是,随手就能捞起一把。发现这一情景的人个个欣喜若狂。他们纷纷跑来报告,说得神乎其神,以至于连我也感到震惊,简直不敢相信,更不敢向陛下您如实禀报……”总之,哥伦布俨然把美洲描绘成了人间仙境。^①1493年,哥伦布的日记和信札出版后不久,既被译成拉丁文及几乎所有罗曼司语。于是,全欧洲的人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传诵了哥伦布的日记和信札。人们在哥伦布的文字中重温了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马可·波罗的东方神话和骑士小说的种种玄想,甚至验证了《圣经》中先知先觉们关于福地的预言。从国王到平民,即使最不轻信的人也无法抵御哥伦布带来的这一历史性狂热。西班牙人更是欣喜若狂。哥伦布每次航行回来,所到之处都是万人空巷,官员迎迓,尤恐不及。哥伦布的《航海日记》和《信札、奏呈》更是人人竞相传阅。它们再一次唤醒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冒险精神,新大陆成了时人的第一话题,并使无数英雄好汉、流氓无赖神摇意夺,梦魂颠倒。用约翰逊博士的话说,哥伦布“苏醒了欧洲人的好奇心”。^②

未几,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类似的岛屿,之后又有托尼的《世界》、帕特里齐的《幸福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等以新大陆为主要指涉的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

所谓众议成林,无翼而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这种情况更是令人唏嘘不已。而且表现是双向的。除了介绍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还通过文学等多种渠道传播、推销自己的文化和价值。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仅以我最近的初

步涉猎,就发现西葡古典文学中充斥着以海洋文化为主要载体;以东方,尤其是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帝国野心。

如果说塞万提斯提到中国只是一种戏谑式的自嘲,那么可以想见的是当时中国在西班牙人心目中的地位。塞万提斯说“最急切盼着堂吉珂德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派特使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珂德送到中国去,他要为他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员,打算用堂吉珂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当院长。我问那钦差,中国皇帝陛下有没有拖他送来路费。他说压根儿没想到这一层”。^③关于这一点,《堂吉珂德》的英译者塞缪尔·普特南在译本中加注替塞万提斯美言,说明朝万历年间神宗皇帝翊钧通过传教士与西班牙国王有过书信往来,而塞万提斯很可能听说了这件事情。这当然是文人的一种善意的推测。事实上,即使是在哥伦布指向东方的航行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之后,西班牙殖民者也没有停止过觊觎中国的侵略梦想。关于这一点,我后面再说。

先说当时声名远在塞万提斯之上的诗神贡戈拉,他的重要作品《孤独》可能也是指向东方或中国的。该诗的第一部分完成于1613年,较塞万提斯的戏谑早整整两年。时年,友人透露了贡戈拉的创作动机,谓此作将由四部分组成,分别象征人生的四个阶段,同时又与一年的四个季节相对应。然而,这首长诗除第一部分完整发表以外,第二部分即是未竟之作,第三、第四部分则始终没有面世。第一部分明确阐发了轻士绅、重农耕,远宫廷、亲乡村的思想。作品从春天的某一天写起,经古希腊神话的点染,至主人公因失恋而入海,而后靠着一块救命的木版漂至遥远的彼岸,进入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偏僻山村。白天,人们唱着山歌干活,晚上燃起篝火舞蹈。鉴于新大陆已经成为总督们的大陆、暴发户的乐园,贡戈拉讴歌的这个世外桃源当不应该是美洲,而更像是门多萨等人笔下的中国。此外,诗人还在不同的地方多次提到中国和东方,而且充斥着令人神往的意象,如驯顺的东方,蘸着露珠的鲜花的芳香,还有珍珠和美玉、黄金和宝石,等等。

相形之下,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指涉更为明确。他创作于16世纪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对中国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描写。其中几节大意如下:哦,骄傲的帝国,闻名遐迩;/世上再没有一块土地堪与媲美,/她就是中国……/从热到寒带,幅员辽阔。/呵,城墙耸立,高楼如林;/山峦叠嶂,河流纵横;/城池鳞次栉比,财富享用不尽;/皇帝仁慈,王子聪颖……

卡蒙斯号召同胞们来领略这自然的造化、神灵的青睐。^[2]

史料证明,卡蒙斯是继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之后最重要的葡萄牙航海家之一,出身于航海世家,父亲当过船长,到过印度,并最终客死异乡。卡蒙斯大学毕业后曾被擢升为宫廷诗人,但因与往后侍女发生爱恋关系被驱逐,从而开始冒险生涯,并最终抵达澳门和马六甲。当时澳门已被葡萄牙占领,《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主体部分据说就是诗人在澳门的两年间完成的。正因为如此,他在长诗的第十章,也即最后一章中描写了中国,并且表达了他对中国大陆的无限神往。

16世纪,正值明朝中叶,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成了海洋霸主,甚至控制了我国的东南沿海。中国的航行范围,被大大压缩,以至于原来我们非常熟悉的印度洋也有几个世纪见不到华夏船只。

而这一时期正是西班牙不可一世的全球扩张时期,这期间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在西班牙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的掌控之下,葡萄牙再次归属西班牙。加上意大利、撒丁岛、西西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④及其美洲殖民地和亚洲的果阿、菲律宾、马六甲、澳门,非洲的赤道几内亚、莫桑比克等,西班牙成了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其野心之大,大到开始觊觎我华夏大地的地步。这个尽人皆知的史实背后便是未必尽人皆知的西葡殖民者的一系列文化准备。首先,人类第一幅世界地图是由隶属于西班牙帝国的佛兰德(即现在比利时一带)的学者热拉尔·德·克雷默^⑤于1569年绘制的。对此,我国的一些学者对此仍有异义,更不必说心悦诚服,因为他们认定最早的世界地图是公元14世纪我国明朝洪武初年的《大明混一图》(它虽然包含了非洲,却并没有标出美

洲),甚至还有将世界地图上溯至《山海经》的。这就像在说哥伦布之前我们已经发现了美洲或者高速等人玩儿的便是足球的祖宗一样,我们姑妄说之,别人姑妄听之罢了。然而,历史事件的意义有时不在于发生的早晚,而往往在其所产生的效果。

且说第一张世界地图的产生适逢西班牙帝国如日中天,也恰恰是应其全球扩张的需要而生。无独有偶,西方的第一部中国历史也是在这个时期由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编撰的,名曰《中华大帝国史》。此人曾经这样描写我们的国家:帝国复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青少年,好像妇女们天天都在分娩。说到这里,他还刻意补充说,孩子们小的时候都很好看,言下之意是长大以后我们都成了丑八怪。尤其是我们男人,具体说来不是小眼巴眨,就是不长胡子。至于气候及物产,他认为这必定是上帝为挪亚选定的福地。全世界都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啦。五谷、果蔬、各种矿产、丝绸、裘皮、各色鲜花、香料等等,应有尽有,而且非常便宜,像是白给似的。两磅鸡肉仅需2分钱,两磅猪肉则只要1分钱,一头大鹿也只卖2块钱。他说我们非常勤劳,凡有居民的地方就不留下一块荒地,也最不能容忍慵懒和偷盗。他还说我们不喜欢战争,也不喜欢迁移。说我们天生好吃,讲究穿着,没有统一的信仰,信鬼胜于信神。

虽然他也从正典和史书中获得了关乎中国的许多客观情况,但字里行间充溢着主观和臆断。这与十六至十七世纪西班牙驻菲律宾历任总督的猜想不谋而合。早在1569年,德拉达就提出了占领中国的设想,认为只要上帝愿意,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中国。未几,桑德继任总督,他于1576年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正式上书,自称已经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甚至信誓旦旦地写道,中国人像一盘散沙,既不尚武,也不好战;虽发明了火药,却没有火器。百八十个海盗就能将一座数万人口的大城市洗劫一空。倘使我们能集合4千至6千人马,配备足够的船只和火器,就可以各个击破,那么占领中国将易如反掌。

然而,当时崛起中的英国才是西班牙的心腹

大患。腓力二世虽然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垂涎三尺,但当时他正致力于兴建无敌舰队,根本无暇顾及,否则中西之间恐难免一战。当然历史不能假设。问题是连当时的西班牙传教士也纷纷上书国王,敦促进攻中国。其中耶稣会教士桑切斯在1586年亲呈腓力二世的《论占领中国》中更是狼子野心,暴露无已。他请求国王派遣一支由曾经隶属于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1至2万人组成的联合军队,再加上5至6千菲律宾及日本人即可轻取中国。他还建议军队由耶稣会东方分会来领导,以便协调其军政事务。为了劝诱和鼓励士兵,他建议王国指派有关人等宣达占领中国的诸多好处以及中国人温顺驯服、勤奋好学的美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即使是在“无敌舰队”败北于英吉利海峡之后,仍有不少政客、教士和冒险家一再上书西班牙王室,直至18世纪末的1797年,即嘉庆二年,菲律宾总督阿吉拉尔还在鼓动和忽悠西班牙王室挥师东征并占领遍地黄金、满目白银的中国。他甚至毛遂自荐,主动请缨。^⑥

问题还不仅于此。西葡殖民者同样没有忘记把自己的文化产品传入中国。我们知悉,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从唐代大秦景教^⑦算起,至明朝西葡传教士的涌入,至少已有近千年的历史。除了宗教的传播,中国和西方贸易也因澳门或菲律宾、马六甲经墨西哥至塞维利亚或里斯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贯通而趋于繁荣。这些当然都是众所周知的。但一般而言,史学界在讨论中西方关系时,大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宗教及政治经济范畴,顶多由此延伸至科技、美术、建筑等显性领域,对于相对隐形的文学则犹如无何有之乡,极少顾及。而事实上,早在16世纪,西方文学便开始经传教士之手大量传入中国。除我们耳熟能详的利玛窦(Matteo Ricci)外,不少西班牙传教士加入了文学传教(或《圣经》故事的文学化)工作。

举一反三,这是传道者的秘诀。文学则是他们首选的工具。且不说《圣经》本身的文学性,即使像利玛窦那样的中国通,也不忘藉西方文学以传教布道。他的《畸人十篇》和《交友论》被公认为是文学作品。前者名为与中国士大夫对话

集锦，实则是借助《伊索寓言》以阐述教义的范例。后者更是辑录了自西塞罗到伊拉谟斯历代西方文人墨客的交际思想与警句格言。然而，现在大家只知道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但未必知道他还有很深的西葡文化背景。首先，他到东方来，是受了葡萄牙天主教会的委派，从里斯本出发，到葡属殖民地印度果阿去传教的，却辗转来到了中国；其次，当时意大利隶属于西班牙，他离开意大利和塞万提斯随军进驻意大利几乎是同一时期。也正是因为这些渊源，利玛窦除了精通拉丁文和希腊文，还熟练掌握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利玛窦最后死在中国。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上呈奏疏，请求皇帝开恩，破例准其就地安葬（即改变将在华传教士遗体一律送往澳门神学院墓地下葬的惯例）。他在奏章里写道：利玛窦年老病故，情实可悯，况利玛窦自入圣朝，渐习熙明之化，读书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颂圣一念，犬马报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颇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来上国，亦为缙绅所嘉？吾等外国微臣，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查赐闲地亩余，或废寺闲房数间，裨异域遗骸得以埋葬，而臣等见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规，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云云。虽然朝廷中不乏反对之声，但还是很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照准，于是，利玛窦被葬于二里沟滕公栅栏（现北京行政学院内）。

而这个西班牙人庞迪我和稍后进入大陆的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继承利玛窦的衣钵，在深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基础上传播教义。前者的《七克七卷》曾广为流传，盖因它不拘一格地用西方文学，乃至儒家经典的范式，并从天人、人人、自然之人等不同角度全面阐述了天主教神学理念。而他的《实义续编》则是对利玛窦《天主实义》的补充。传教之余，庞迪我还投书托莱多主教古斯曼，详细介绍中国的情况，并纠正了门多萨《中华大帝国史》中的一些讹误。同样，阳玛诺曾任耶稣会中国及日本教区负责人，他用西班牙贡萨洛·德·贝塞奥等

诗人的演绎方式注疏《遵主圣范》（甚至易名《轻世金书》）；并用《尚书》体解释《圣经》，著有《圣经直解》等。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不能说这些传教士个个都居心叵测。他们传播教义、促使西学东渐或东学西渐本身，也不是一个好得很或糟得很可以说得清楚。况且他们不无矛盾之处。拿阳玛诺为例，他一方面传播教义，另一方面又亲自讲授伽利略的天文学思想，甚至帮助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铸造火炮以对抗清军。当然，一种猜想是他不愿看到剽悍尚武的满人长驱直入。

谈到这个话题，西方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有人问利玛窦（一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国人，哈布斯堡王朝教士），你说的中国如此丰饶、如此强盛，会不会对西方产生威胁呢。利玛窦回答说，永远不会，理由是中国人尚文不尚武。

利玛窦或汤若望说对了。如今，我们研究海洋文化，便更不具有夺城掠地的野心，而完全是出于了解和借鉴的目的。况且旧殖民体系已然瓦解，传统的殖民方式更是难以为继，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便是明证。而资本在完成了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其国际垄断方式正在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全面展开。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经济的交往更需要狭义文化和文学的贡献。前不久西班牙中国鞋店被烧，法国华人超市被焚，多少从反面印证了一些华商在生活方式、经营理念和修养等方面的严重缺失，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无知。而文学无疑知己知彼的一个极佳的方式。首先，文学是各民族的综合体现，因而也是民族文化及其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它好比某种基因，使各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淹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其次，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

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外国文学作为他者的文化精髓,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和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的论述精辟而中肯。马克思说,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说,在了解法国的历史和现状方面,他从巴尔扎克的作品里学到的,“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何也?荀子云,“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这是明人之道,也是文学之道。

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外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接近、了解和借鉴他者的翔实而鲜活的历史画面与现实情境。这正是我们赖以存在并研究外国文学的理由,因为这种接近、了解和借鉴正超越其他目的,成为某种更自在、更清醒的认知和审美享受。换言之,我们研究文化及文学的目的也不都是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图的学以致用。从本文的主旨和今天的话题来看,虽然文学的有

用和无用将继续徘徊在人类精神与物质的永恒矛盾之间,但作为结束语,我不妨援引王国维引申老庄思想的话说,文学乃“无用之用”。这可能更符合今天我们和各民族和平发展、友好相处的愿景。

注释:

- ① 参见《哥伦布如是说》,梅嫩德斯·皮达尔编纂,详见《古巴杂志》1940年总第14期第5-58页。
- ② 转引自乌雷尼亚:《西班牙语美洲文学思潮》,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出版社,1949年第10页。
- ③ 参见《堂吉珂德》,马德里,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暨世界西班牙语国家语言学院2004年纪念版,第547页。
- ④ 哈布斯堡王朝,它当时包括现在的荷兰、卢森堡、比利时、德国、法国东南部、瑞士、奥地利和匈牙利、斯洛伐克、波希米亚等广袤的领土。
- ⑤ 热拉尔·德·克雷默,他的拉丁名字是墨卡托,意思就是“商人”。
- ⑥ 维利亚尔:《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语世界在亚洲的扩张》,墨西哥,FCE,1980年版,第768至879页。转引自张凯:《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69至78页。
- ⑦ 唐代大秦景教受东正教的排斥的一个拜占廷基督教宗派。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北京:三联书店,1956:132-145.
- [2] 卡蒙斯.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十唱[M]. 里斯本:国家出版社,1970:402-403.

Hegemon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n Classic Spanish and Portuguese Literature

CHEN Zhong-yi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s a long history. But in general, when discussing about the relations, the historians often concentrate on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areas or at most the areas of technology, arts and architecture, and neglect the relatively invisible literature. However, litera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al renaissance,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as is shown in the communication that some of the oldest colonial countries like Spain and Portugal made with China.

Keywords: marine literature; Spain; Portugal

(责任编辑 张文鸯)